

审时度势 郭良平

#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待克服

马克思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它导致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延续至今，使社会主义仍然有现实意义，也是中共坚持并看好社会主义前景的原因之一。但社会主义也有基本矛盾，它导致了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

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可分为政治和经济两类。经济上的基本矛盾大家都熟悉，就是僵化的计划体制，普遍缺乏的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它导致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停滞和科学技术上的全面落后。在中国，毛泽东企图另辟蹊径，用“抓革命，促生产”来提高积极性，结果也失败了：不仅使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落后，还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民族灾难。

然而，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人们则知之不详。这种认识上的模糊，使社会主义国家历来的改革不得要领，迷失方向，最终导致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崩溃。目前中国政治在某些方面的倒退，也与这种认知模糊直接相关。

30年前苏联和东欧的突变谁也没有料到，但却最能揭示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它之所以出乎意外，是因为主流的政治分析方法，根据的是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苏共亡党亡国时的客观情况是，强大的苏联红军一直处在党组织的严密控制下；社会是一盘散沙，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党派和大规模社会运动；1000多万党员占据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所有重要位置。也就是说，无论从力量对比还是利益关系上来看，苏共的统治都应该是稳如泰山。

但庞大的苏联帝国一夜之间消失了，留下的漩涡为历史划上了一个大问号。

## “苏东波”是一种道义革命

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波”，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道义革命，而不是由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引发的革命。驱动道义革命的是义愤；义愤填膺之下，那些明知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可能受损的人，往往也积极参与革命行动，使体制内突然冒出反对力量，使庞大的专政机器突然失灵，这才是最致命的。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可谓“苏东波”的导火索；当时广场上也出现了大批打着体制内单位旗帜的游行队伍，使中共政权从内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道义革命是不平而鸣，是由正义感而爆发的群体行动。道义革命不须要刻意去组织；触发它的是一种共同的道德判断，是一种在无形中扩散的大众心理和情绪，与贫困或物质生活条件很少关联。本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爆发的抗议运动，很多都属于这种类型——它们都发生在世界范围内贫困现象减少最快的时期。

尽管这种道德认知和对抗情绪是长期积累的，也是长期心理挫折的产物，但它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达到爆发点则不可预知。它的后果却很清楚，是当权者被扫地出门，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彻底崩溃、完全丧失合法性（至少在短期内如此）。这是因为道德判断，尤其是群体的道德判断，永远非对即错，非白即黑，从不留余地。道义革命对革命后的建设往往毫无准备，也缺乏共识。其历史作用可能是社会进步，但更可能是长期混乱甚至倒退，就像苏联崩溃后的俄罗斯和之前的法国大革命那样。

苏共亡党在政治上的根本原因，是执

政党的腐败、特权化，脱离群众，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被广大群众甚至普通党员干部无情抛弃。其必然性是这个政治体制运作的基本逻辑所决定的，是“斯大林魔咒”的结果。这个过程揭示出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是先锋党统治在两方面要求相互冲突的产物。

第一方面的要求是：这个制度必须是威权性质的，选举民主在其中难以立足。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列宁主义的先锋党，也就是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先锋党不是为了赢得选票，而是围绕着实现某种理想而组织起来的。

它的领袖是这种理想的最高代言人，因而也是党内的最高权威。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制定的行动纲领，要求很强的纪律性来组织实施；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以及绝对忠诚、自觉服从等。这些都赋予先锋党以鲜明的纪律性特点，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模式，和普通民主的授权逻辑正好相反。正因为不需要选票来执政，先锋党天然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因为各层官员的职位是自上而下任命的，向上而不向下负责是这个制度的铁律。这样，无论是整个党还是各个党员干部都有脱离群众、形成封闭的利益集团或特权阶层的趋势。

## 高道德要求却权力腐败

第二方面是先锋党执政对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要求很高，在现实中体现为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质上的高标准。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下，以身作则的先锋模范作用和一定的政绩，在党外是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方式，在党内则是上级在下属中威信的来源。两者对维持权力的金字塔和运作方式都至关重要。

中共在党内外打的都是民心牌，而不是选票牌。打民心牌必然造成对党和党的干部的高标准、严要求，尤其是在道德品质方面，讲究的是立身、立言、力行和立信。中共提拔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以德治党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有别于其他威权体制的地方。

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表现在一方面是对政府和官员的品质和能力上的高期待值，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既缺乏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又没有内部有效的制衡，使权力在这个体制下极具腐蚀性，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拒腐蚀，永不沾。于是，一方面先锋模范，另一方面偷鸡摸狗；一方面高调反腐倡廉，另一方面腐败发展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尤其是用人上的腐败使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经济受损，社会风气败坏。

这是一个不断吊高希望，又不断生产失望和义愤的体制：执政党说好了是永远达不到它给自己定的高标准；说坏了是它自己总打自己的嘴巴。这种矛盾性注定了民心牌的失败。民间和党内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一个可靠指标就是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笑话有多少），为道义革命的爆发准备了充足的火药，只待引发。

中国这40年来的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呢？可以说经济方面的基本矛盾解决得相当成功：计划经济的废除去掉了大块僵化的官僚体制；引入市场竞争和民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的问题——中国经济的起飞就是证明。

在解决政治上的基本矛盾方面也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尤其是在加强法制和各项规章制度上，有规可循和有法可依在一定程度上“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语）。但受制于体制的惯性和认识上的模糊，一些重要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倒退。

目前中共解决社会主义政治基本矛盾的方式是“全面从严治党”——完善和强化党内法规，增强党员干部的道德情操和理想信念。其实质是提升党的状态，使之更符合高标准和高期待，而不是降低标准和期待值。这个方针导致了空前力度和持久的反腐运动，并期望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包括党纪和法制建设，以达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果。

与此同时，通过“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全面提高党执政的各种能力，包括决策力、协调力、执行力、调集资源和集中力量的能力、解决社会矛盾和保证政治稳定的能力等等。习近平说对这个体制“不该改的坚决不改”，并非全是像有些人讲的冥顽不悟，而是想保留这些制度优势。

在党外，近些年来中共更加强调整政权的“人民性”和“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自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它在扶贫方面下了大气力，对老百姓的诉求反应迅速，往往比民选政府都灵敏。过去40年里，中共的政策基本符合民心国情，它在民调中的支持率高于大多数民选政府，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堪称奇迹。

但这个改革方针只能缓和而不能化解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矛盾，其“坚决不改”也有盲目的一面。“斯大林魔咒”仍在上、中、下三层作祟：在上层，近年来个人崇拜不时出来兴风作浪，就是认识糊涂的突出表现；在中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等旧毛病有所回潮，加之又有懒政怠政和不作为等新毛病；在下层，“增强人民性”基本上没有人民什么事，而且缺乏制度保障，要靠自上而下的压力来实现——干部仍然处于既可以做牛做马，也可以作威作福的状态。这些都有体制性的根源。

在强调干部的理想和政权的人民性、为人民服务上，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同毛泽东比肩。在同一条路上毛都失败了，更何况别人。习近平不同于毛的地方是法制和制度建设，但他同毛一样追求大权独揽，削弱了制度建设的可靠性。

将党组织扩展到所有经济社会组织中去，实际上是在扩大社会主义政治基本矛盾的作用面。这样是否能够提高党的控制力和执政水平仍存疑，但苏共的历史经验表明，它使党背上了无限责任——任何一个党员干部干了坏事，都会被算在执政党的头上。最后，政治上的迷失也可能导致经济上的基本矛盾再现：党组织在微观上对经济社会加强控制，有可能导致“计划经济”（command economy）的复活，导致党权压制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削弱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结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在，需要新思维和更彻底的改革来化解。在没有彻底解决基本矛盾前，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使有以前的巨大成就，仍然是盲目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所高级研究员